

国企 CEO 步入政坛解读

核心提示

市场环境复杂多变、经济规律深邃内隐、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融通以及内外关系对政府的制约,政府需要决策能力强、有胆识、有谋略的人才充实到党政领导班子。

2008年1月25日,在山西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世界最大不锈钢生产企业——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川平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

此前,上海宝钢老总艾宝俊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一汽少帅竺延风担任吉林省副省长,长城电脑掌舵人陈肇雄担任湖南省副省长……国企 CEO 纷纷上马,显示了中央在培养未来可用人才时的多样性选择。

在十七大之后的人事调整中,一批国企 CEO 步入政坛,出任地方党政要职,掀起一股“商而优则仕”的热潮。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从商场转战官场,在他们身上是否有共同的素质特征?在众多国企 CEO 中,他们凭什么脱颖而出?中央对他们委以重任,又是看重他们身上的哪些能力?

转战官场路线图

不可否认每一个政坛 CEO 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可圈可点的功绩,他们的成功不可复制,但是不难发现,他们身上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素质特征:年轻、高学历是这个群体的标签。他们大多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参加工作,年轻是他们共同的特征。陈川平生于1962年,艾宝俊1960年出生,竺延风1961年出生,陈肇雄,1961年生人。他们都具有高学历,早在1989年,陈肇雄就已在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获博士学位。艾宝俊,硕士,高级会计师;苗圩,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竺延风,浙江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从企业家角色转变为政治家角色的路线其实是有章可循的。首先,他们大多是从地方的副职起步,几年以后逐步转正,例如卫留成、郭声琨。2003年4月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卫留成调任海南省副省长、代省长,2004年2月当选为海南省省长,2007年4月被任命为海南省委书记。郭声琨,2004年4月从中国铝业公司任总经理、党组书记兼中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的任上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同年6月,郭声琨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2007年12月被任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其次,他们从政前,早已有从国企过渡到政坛的迹象,卫留成、郭声琨、竺延风早在2002年十六大时就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而陈川平是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另外,此次从政的 CEO 大多数都于从政前在被誉为国企“黄埔军校”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学习过。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训国企、金融行业高管的干部,直属中组部,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以及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三所干部学院共同构成国家级培训基地“二加三加一”体系。



企业家特质

他们是杰出的企业家,他们不仅使国企扭亏为盈,而且引领国企走向世界。与其说他们是企业家,不如说他们是战略家。他们总是能够准确地理解和分析政治、经济形势,不失时机地把握变幻莫测的市场前景。他们国际化的视野和准确把握大局的能力,让国企不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和发展后劲。

统率全局的战略眼光。竺延风,38岁就出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众所周知,一汽是汽车业的共和国长子,背负着重要的民族情感和中国汽车业自强的使命。1999年到2007年,在竺延风掌舵的9年里,通过一连串的兼并、重组与合作,一汽从早期机制陈旧的国有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强势的汽车集团,一汽国际化大集团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竺延风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1999年,他接任总经理时,一汽的利润只有1.5亿元,2007年,在他调任吉林省副省长前这一数字达到123亿。竺延风,不到40岁就当上国企老总,是中国最年轻的国企老总之一,41岁就已经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名单中。

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统率全局的战略眼光都是必备的素质。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地方经济要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政府管理者必须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和统率全局的战略眼光。

勇于决策的胆识和谋略。政坛 CEO,他们既有制定正确的经营方案的谋略,又有将正确决策付诸实践的勇气和魄力,同时还具备促成共识,感召他人共同愿景奋斗的能力。

郭声琨被众人知晓,源于中国铝业在纽约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时任中铝 CEO 的郭声琨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波,因为中铝刚刚重组分拆成立,正筹备纽约上市,相关事宜业已进行过半。恐怖袭击事件导致美国股市萧条,郭声琨坚持要如期上市,此言一出,即招致中铝股份的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和全球联席簿记人——中国国际金融(香港)有限公司的齐声否定,摩根士丹利董事长还让郭声琨写亲笔信,表示风险太大,反对中铝上市。果然中铝全球路演挫折不断,路演第三



天,副承销商美林证券和高盛集团公布了其最新的研究报告,调低了对未来铝价的预测,紧接着拟持股中铝8%股权的美国铝业公司因不看好股市,全球裁员6500人;继而为中铝股份的审计师普华永道建议公司调低2001年的利润预测。

决策已经作出,付诸实践需要勇气和气概。郭声琨采取了几乎“疯狂”的一对一会议方式,与投资者直接面谈,最高峰一天要开9次见面会,“在企业基本面差不多的时候,基金经理们之所以买你的股票,可能就是那一个小时的单独面谈的功劳。”郭声琨通过这样的“定点爆破”,终于在2001年12月12日,让中国铝业在纽约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9·11”事件后在海外上市的第一家中国公司和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亚太公司。郭声琨勇于决策的胆识和谋略可圈可点。

创新意识:政坛 CEO 共性

不管作为企业家,还是政治家,敏锐、果断、正确地决策重大问题的能力和魄力显得尤为重要。市场环境复杂多变、经济规律深邃内隐、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融通以及内外关系对政府的制约,政府需要决策能力强、有胆识、有谋略的人才充实到党政领导班子。

创新意识。管理创新、制度创新、观念创新,政坛 CEO,他们的名字经常与创新联在一起。

苗圩,原东风汽车集团 CEO,现任武汉市市委书记。全面合资是他的第一大创新。2003年7月,在他和日产汽车总裁戈恩的共同主持下,东风和日产汽车合资167亿元成立各占一半股权的东风汽车有限公司(简称“东风有限”),东风集团的大部分人员和家底都投进了“东风有限”这个合资公司。和所有老汽车企业一样,东风原有的主要汽车业务是商用车和零部件,而这两块业务都被东风集团投进了合资公司。东风的这种做法,被称为国企改革中的“东风模式”。进行全面合资是观念创新,与另两大汽车集团的发展模式相比,上汽是与大众和通用合资组建两家轿车合资企业;一汽也是合资,但是老家商用车基本上还留在集团内作自留地。上汽和一汽并没有像东风这样进行全面合资。东风与日产的合作重组被国资委认可为国企改革“一个很好的典型”。



开合法地建立了党组织”。东风与日产的合资谈判经历了两年多时间,其中关于合资企业党组织的建设问题,前后谈了3个月。在东风的强硬态度下,日产的谈判代表把英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详细地阅读和研究过以后,最后终于在合资合同中签署了设立党的机构组织的文件。这种制度创新被中央认可,中组部随后下发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党建的规定,把东风创造的这种模式进行推广。

创新是企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企业永葆生机的源泉。对于政府,创新也是必不可少的。政坛 CEO,他们能够运用各种创新策略,使原本僵化的官僚体制恢复活力。

改变地方生态

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地方政府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复合经济发展,需要懂市场、懂经济、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不懂经济的管理者领导地方发展经济,尽管身后会有各种高参,但这都不能替代管理者个人的职业判断。懂市场的管理者领导地方,利于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地方涉及市场经济的问题可以很快从经济学的角度得到重视和解决。先摸透市场经济的标准,再加入政府,与单一的政工、理工出身的政府组成人员形成互补,优化领导班子结构。

政坛 CEO 管理专家,具有最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他们讲究实用主义,满足民众需求,并以公众满意度作为判断公共服务优劣的标准,以其特有的企业家精神重塑地方政治经济生态。

卫留成掌舵海南。2003年中海油老总卫留成初到海南,一头扎下基层,连续考察了18个市县后,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撻下了“海南是欠发达省”的结论。卫留成说出大实话,着实让老领导汗颜。企业家出身的他,摸清家底是做企业的本能。

2004年2月,代省长转为省长后,在第二天的媒体见面会上,他就提督嗓门发出了偿还政府债务的信号。海南历年欠账近200亿,仅交通一家就高达97亿,历来“新官不理旧账”,卫留成硬是和旧账较上了劲。卫留成的用意很明显,重塑政府诚信,改善投资环境。在市场中,诚信是一个企业强大的必备品质,在公共领域何尝不是。

公共部门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卫留成有



切肤之痛。上任第一个月,他亲自作出的57个批件,只落实了2件,其他的要么不知下落,要么“正在办理”。另一个事件更是惹怒了他,一份表扬6名援藏干部的文件,有关部门2002年4月就提出来了,但竟然经过两年半时间,才“旅行”到省长手里。如何将企业中的高效率、执行力引入公共部门,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卫留成。2004年春节,他给下属局领导每人送了一本《给加西亚的信》,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位美军中尉受总统所托,如何历经磨难,终于把信送到故事。《给加西亚的信》为营造公共部门提高执行力的文化氛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他进一步提出:“提倡政府执行文化”。他是第一位把“执行力”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省长。2005年1月,他为提高执行力又下了一剂猛药。一份《行政首长问责制暂行规定》正式施行,措辞严厉,写明省长有权对基层政府首长的不作为和渎职等行为启动调查和处理程序,轻则通报批评、记过,重则勒令辞职、建议免职。现在,人们很高兴地看到,卫留成将企业的高效率和执行力植入公共部门已见成效,海南的官场文化正在改变。

郭声琨运作产业。2007年12月,郭声琨被任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中铝 CEO 主政铝业重地广西,点燃了广西经济发展的希望之光,广西老百姓对这位国企老总充满期待。

2004年4月郭声琨开始了广西从政之旅。郭声琨的企业家背景及与中铝的渊源,让不少观察家对其在地方运作产业寄予厚望。广西铝矿储量达10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1/2左右。郭声琨到任后,先后促成了华银铝业一期、平果氧化铝三期两大工程的落地,总投资85亿元人民币的广西华银氧化铝一期工程也已投产。郭声琨善于运作产业的特长,一步步将广西铝业打造为中国乃至亚洲的“航空母舰”。

他还主导了广西糖业的大发展。通过建立食糖储备调控机制及稳定原料蔗收购价格等手段,使广西的制糖业迅速发展壮大,目前,广西食糖产量占全国总量超过60%,广西的食糖产量直接影响着全国食糖价格。

郭声琨通过运作产业发展地方经济,已见成效,现在,他已是广西的掌舵人,一系列产业布局战略政策相继推出,可以预见,广西经济将迎来大发展。

据《决策》(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韩资企业非法撤离透视



青岛

核心提示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韩国贸易馆副馆长黄在元最近有了一项“新业务”:作为“企业清算协助小组”的成员之一,为有意撤离当地的韩资企业提供清算方面的服务。

近日,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决定在青岛设立由领事馆、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和中小企业支援中心负责人组成的“企业清算协助小组”。

这个小组成立的背景是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韩资企业非法撤离现象,媒体将这种非法撤离称之为“半夜逃逸”。

“半夜逃逸”

“半夜逃逸”的企业正在不断增多,烟台世刚纤维有限公司(下称“烟台世刚”)就是其中一家。1月12日,烟

台世刚10余名韩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集体连夜“逃”回韩国,创造拥有职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韩企高层集体撤离的纪录。

记者在烟台世刚门前看到,曾经拥有3000名员工的企业已被法院查封,大门是“铁将军”把门,冷冷清清。

当地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韩国高管连夜撤离没有任何迹象。公司在1月12日之前还正常运转,到了13日发工资的日子,人们突然发现公司的韩国高管都不见了。公司还拖欠着每个工人一个半月的工资。

烟台世刚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本为804万美元。主要经营织布、染整、服装印花、刺绣、服装加工,产品以出口为主。

现在,烟台世刚留下的一堆债务和一群失业的工人。据媒体报道,烟台世刚所欠外债大致分为5类:银行贷款1500万元人民币(非注明皆为人民币)左右,海关税款500多万元,场地租金、水电费用200万元左右,供应商外欠商欠款3000多万元,工人工资200多万元,合计5400多万元。

像烟台世刚这样连夜逃逸已经不是个案。黄在元告诉本报记者,按照我国方面的统计,现在在山东有韩资企业2万多家,韩国方面的统计数字是1.2万多家,其中在青岛市有6000到7000家,从2000年到现在,大概有200多家韩资企业非法撤离。

在青岛,胶州市又成为“重灾区”,已经有超过100家的韩资企业选择了非法撤离。同时,黄在元也认为,韩资企业非法撤离现象有被媒体夸大的成分。因为非法撤离的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3%左右,也并非只有韩资企业存在非法撤离,合资等企业也存在这一现象。

为何不能按照企业正常的破产清算程序来实现退出呢?黄在元告诉记者,关键在清算过程过于复杂。

来去无牵挂

黄在元认为,韩资企业非法撤离直接原因之一是清算程序的复杂,而深层次原因是中国产业、用工、人民币升值等“基本面”的变化。

黄在元告诉本报记者,韩资企业在进驻的时候,往往能得到当地政府“一条龙服务”,手续简单快捷,因为当地政府引资若渴。而到企业清算撤离时,手续就非常繁杂了。

黄在元认为,根据他的观察,当地政府虽然在外资企业撤离上不刻意设置障碍,但起码是不积极的。

且,在企业撤离前,当地政府也会要求返还当初进入时接受过的各种优惠。

黄在元说,“以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不大考虑企业的行业、水平、性质、特点等,结果造成了环境污染等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不能再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

“从今年开始,劳动力成本提高,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也统一了。以前许多地方对外资企业使用土地是免税的,从今年开始,免税优惠政策开始取消。”黄在元说,“这尤其对劳动密集,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冲击最大。”

“劳动力成本对大型企业来说,占到总成本的3%左右,而中小企业要占到20%~30%。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很难承受。另外,近年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出口加工企业也受到很大影响。”

福山区对外经贸局相关人士也认为,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对以廉价劳动力获得微利的服装贴牌加工企业来说,受到重大影响。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等一系列政策因素,正使外资企业享受到的优惠政策逐步减少。

韩国进出口银行去年曾对随机挑选的598家在华韩企进行调查,发现51.8%的企业净利润出现亏损,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亏损比率超过了70%,连业绩比较好的汽车行业亏损比率也达到40.3%。

黄在元认为,随着中国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及产业结构调整,韩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预计将更加困难。许多中小韩资企业存在污染、能耗等方面的问

题。而韩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半夜逃跑”,另外的原因是他们“来去无牵挂”。招商银行青岛某支行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现在韩资企业大多采用的

是独资方式,中小企业很少有花钱征地或者购买机器设备的。往往是租用厂房、设备开工生产。一旦经营不下去,拔腿就走。中方少有对其约束措施。所以他们支行就很少与这些韩资中小企业展开合作。

青岛当地熟悉韩资企业的人士则这样告诉记者,一些韩资小企业,在韩国国内并没有什么根基,就是一些普通人、资金、技术等很缺乏。他们到中国来投资,个人也是抱着捞一把就走

韩国救赎

韩资企业非法撤离现象已经引起中韩两国政府的重视。有消息称,1月30日,韩国派出总统特使到中国,就撤离事件和中方沟通。同时,2月19日,韩国政府宣布,外交通商部将在韩驻华使馆新设“困难企业咨询支援中心”,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和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等机构组成“企业清算协助小组”;韩国政府也正在讨论将恶意非法撤离的企业主移交司法处理。

黄在元告诉记者,此前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访问韩国,也与韩国有关方面就韩资企业非法撤离现象进行了磋商。

青岛对外经贸局相关人士告诉本报记者,青岛市相关部门正在对此展开调查,也会采取

相应措施。黄在元说,韩国政府对韩资企业非法撤离非常重视。由政府出资聘请会计师、律师对以后有意撤离中国的企业进行清算协助。“在韩国,聘请会计师、律师的费用是非常高的。”

“中国是韩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韩国企业的非法撤离给韩国商人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是韩国政府和商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黄在元说。

但黄在元认为,在青岛成立的“企业清算协助小组”对此前非法撤离的韩资企业可能起不到作用,也无法对他们遗留的问题进行救济,成立该小组的目的是着眼于防止今后出现更多类似事件。

黄在元同时建议,今后要防止这类事件的频繁发生,中国地方政府也应该加强对投资商的考察、甄别。“现在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方面的竞争太激烈。”黄在元说。

2月29日,黄在元告诉记者,烟台世刚的老板已经在韩国聘请了律师,到烟台就企业的清算展开工作。

据《第一财经日报》



烟台